

# 美好的回憶永難忘

● 嚴在寬（大陸作家）

中國抗日戰爭期間，中央大學自南京遷校重慶，在柏溪設一年級，作為分部，在沙坪壩松林坡設二、三、四年級，作為校本部，隨後又設研究院，醫學院則設在成都華西壩，在儀器設備與醫療器械方面和華西大學附設之四順祠醫院及陝西街五官科醫院通力合作。全校有文、理、法、師、工、農、醫七個學院，學生人數居全國各大學之首，在統考中報名人數最多，錄取分數最高，考生以能錄取中大為榮。師資力量充實，許多教師都是國內有名的專家學者，不少人還享有國際聲譽。圖書儀器較多，遷校時毫無損失。中大之所以被人特殊重視者就因為具備了上述的主客觀條件。

我於一九三九年考入中大法律系，一九四三年畢業，其間所見所聞及所經歷者甚多，現錄其印象最深者如次。

## 根據需要更換校長

我在校期間凡經三位校長——羅家倫、顧孟餘、蔣介石。

羅家倫知識廣博，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文學藝術多所涉獵，文筆犀利而雋永，語言娓娓動人，時有幽默感，我們最愛聽他的即興講話，有啟發性。可惜博而不精，且熱衷政治，未能成為卓然有所樹立的大學者，故謂之通才也可，謂之專家則未也。但他的睿智、毅力及辦事能力不能不令人折服，此於遷校、擇地及弘揚中大足以見之。

一九四七年我在教育部任秘書負責審核全國高等學校來往文件時，羅先生正準備出使印度，曾來教育部，師生相見倍感親切。爾後形勢變化，消息隔絕，近見中外雜誌始知羅先生早歸道山，令人惋歎。

顧孟餘在蔡元培長北大時曾任經濟系教授、教務長，與蔡元培辦學方針，學術思想自由，兼收並蓄相契合，後加入汪精衛的改組派成為該派的第二號人物出任鐵道部長，因愛國心強與汪精衛政見不合掛冠而去。抗戰軍興，同蔡元培先生等旅居香港。一九四〇年蔡元培去世不久，太平洋戰爭前夜風雲緊急，一九四一年春，蔣介石先生派陳布雷持其親筆函邀顧孟餘回國「共商國是，共赴國難」，但回國後不肯擔任政府工作願辦教育，因而出任中大校長。

顧孟餘長校期間有二事值得注意：

(1) 主張學術自由，一切黨派退出學校。

(2)一九四二年夏在應屆生畢業典禮大會上當著全校師生員工數千人表示要把中大辦成真正的最高學府最大的大學，與牛津、劍橋、哈佛、耶魯相媲美。關於前者曾引起校內和社會上少數人的非議，關於後者則博得全校的喝彩。

平心而論，顧孟餘的確想把學校辦得更好，但在工作方法上我行我素，無迴旋餘地。一九四二年下半年為擴充校舍經費不能解決，憤而辭職不再到校，以後移交事宜由總務長谷正鼎（谷正綱之弟）代辦。抗戰勝利後赴上海因無房舍長期居住公寓。我休假到上海曾去拜望，見其生活清苦，沉默寡言，自甘淡泊，人也消瘦了許多。

蔣介石先生以國民政府主席國家元首兼任校長後，歷史系教授沈剛伯曾對同學們講：「你們是天子門生了，要好好珍惜時間，多努力。」

在蔣先生一九四三年春到校之前挽顧風潮迭起，當時我是學生（自治）會主要負責人頗感尷尬。中大老校友著名律師傅況麟消息靈通，同學們從傳處得知某將接任校長就回校貼標語反對，從校內貼到小龍坎、沙坪壩、磁器口，如是接連反對四人，使他們無法到校任職，校中群龍無首陷於混亂，最後乃由蔣先生擔任校長，以朱經農為教育長，挽顧風潮平息。

中大是一所普通大學，與軍事、政治學校不同，故任職後即以普通大學校長的身分出現，每次到校都輕裝簡從，有兩次還坐滑竿進校，身邊只有侍衛二人，把自己的地位和權威淡化了。

有一次同學們正在吃中飯，蔣先生到食堂視察，竟與同學一同吃「八寶飯」，這是羅家倫、顧孟餘前兩位校長都沒有做到的。飯後交代食堂管理人員要改善伙食，沙石太多妨害身體健康，很使大家感動。

我們這一屆畢業時蔣先生親自主持畢業典禮，講話約半小時，是臨別贈言而不是訓話，殷切期望大家畢業後繼續鑽研，學無止境，不斷在現有基礎上提高，為抗戰建國作貢獻。

最後發畢業證書，照座位每排親自發一人，餘在教務處領取，會開得很成功，既莊嚴又和諧。蔣先生到校後，我只讀了五個月就畢業離校，以後情況不清楚。

### 學術空氣頗為濃厚

許多著名教授不顧年老體弱夜以繼日鑽研、寫作，中青教師也很勤奮，石門村教師宿舍深夜十二時以後依舊燈火輝煌，人影照映在紙糊的牆壁上。

講學之風盛行，著名教授如方東美、沈剛伯、王季高等常作公開演講，校內外均可聆聽，座無虛席，走廊上也站滿了人。

同學們求知慾甚強，除學好本系課程外，或選修或旁聽別院系課程。我選修好了徐仲年的法文、汪洋實的日文，旁聽了汪辟疆、胡小石、唐圭璋、伍佩儻、盧前、宗白華、方東美、熊偉、柳無忌、吳祖湘諸先生的文學、哲學課，還旁聽了胡煥庸先生的經濟地理，比我旁聽更多的同學比比皆是。教資好，有的同學拿到本系畢業文憑後不肯離校，再讀政治系兩年（原為中文系），拿到兩張畢業文憑，如胡令德。

排隊借書，圖書館的閱覽室坐滿了人，靜心閱讀，鴉鵲無聲。

## 民主思潮空前高漲

學校社團林立：學校規定的有系會、學生（自治）會，但自發組織的社團如雨後春筍，我尚能記憶者有汪辟疆先生等組織的詩社、朱繼榮等的基督教青年會、丁驥（龍驥）教授等的京劇團、卜慶葵等的話劇團，同鄉會、同學會就更多，難以數計。學校領導對這些社團不聞不問，聽其自然。

黑板報風靡全校：當時的黑板報作為輿論工具和學術探討很受同學歡迎，也是作者煉思想、煉才幹、煉文筆的園地。刊登的文章你說你的，我說我的，言人人殊，大有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之勢，也有扭住不放互相爭論的。部分散文和詩歌，俱見才華，大家很欣賞。但也有惡作劇的，歷史系同學龐遵濂等辦的第一期發刊詞是請郭沫若寫的，不知何人把文章拉下批上穢語後用繩子吊在黑板上，龐見後氣得流淚，把文給我看，可有什麼辦法呢？

文娛活躍：學校請中央音樂學院教授馬思聰率領交響樂團前來大操場演奏貝多芬田園交響曲，給全校師生很好的音樂享受，陶冶高尚情操。卜慶葵等演話劇『雷雨』、『日出』，反映強烈。丁驥教授等演京劇『玉堂春』，丁演蘇三，臺風飄逸，嗓音甜潤，表情嫵媚動人，同學們大飽眼福，有凝神注聽者，有輕輕拍節者。農學院同學周以耕等演『打龍袍』，周演包拯，塊頭大，臺風凝重，一招一式俱見氣魄，嗓音沉雄剛烈，有架子花臉郝壽臣之風，把包拯的乾坤正氣活現在舞臺上。四川同鄉會的歷末餘興，我清唱川劇『高平關』中的大花臉姚姬，博得全場的掌聲。當時的自發組織開會，未了都以唱做小技當場表演，使人盡歡而散。

名人演講：由學校請華萊士、魏德邁、赫爾利來校演講。各社團請社會知名人士則不計其數，有教育家、科學家、軍事家、文學家、政治社會活動家等等，計有蔣夢麟、張伯苓、馮友蘭、錢端升、郭沫若、曹禺、張恨水、章士釗、馮玉祥、陳誠、張聖莊、黃炎培、吳玉章、羅隆基、王芸生、史良等等。張恨水曾偕夫人周南女士和友人張友鸞、張慧劍到學生宿舍訪談，大家印象深刻。思想傾向和政治立場各不相同，打破了在杏壇內弦歌不輟的局面，開闊了視野，在一定程度上還影響將來自己的走向。

## 貸金制度學生受惠

抗戰期間來自淪陷區的大學生大都經濟來源斷絕，極度困難，為解除學生的困境使其安心向學，政府雖在抗戰經費拮据的條件下毅然決定實行貸金制度，辦法是對淪陷區來的高校學生伙食費無息借貸，特別困難者還發零用補助費，由訓導處辦理，登記入冊，學生畢業工作時償還貸金。這不僅解除了學生的困境，有助於穩定後方，還為國家培養了抗戰建國人才，鞏固國本，從道德意義上說，應是一種德政。貸金制度還施之於我們後方籍貫的貧苦學生，法律系教授張慶楨作訓導長時我就請准了貸金，據知獲准者不少。

我畢業時文憑正面印有校長蔣中正、教育長朱經農、教務長胡煥庸三人的名字，背面記載了歷年貸金數，示意須歸還，但抗戰勝利後一概豁免，大家快活不迭。這張文憑我珍藏多年，「文革」中紅衛兵以破「四舊」為名前來抄家，文憑連同我收藏的新舊書籍和古今名字畫一併抄沒，付之一炬。

回憶是美好的，但四年的讀書生涯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短暫的一瞬，形諸文字，以誌不忘。